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严昌洪
何广
编

邹陈杨

天毓

容华麟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4018798

B25
30
V12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严昌洪

邹陈杨

何广

编

天毓

容华麟

卷



北航

C17051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B25
30
V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杨毓麟 陈天华 邹容卷/严昌洪, 何广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0-18564-4

I. ①中… II. ①严… ②何…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杨毓麟 (1872~1911)-思想评论 ③陈天华 (1875~1905)-思想评论 ④邹容 (1885~1905)-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9622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杨毓麟 陈天华 邹容卷

严昌洪 何 广 编

Yangyulin Chentianhua Zouro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5.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1 000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以往一些关于近代人物或辛亥革命志士的传记作品和文集，常有邹陈合传和邹陈合集，如陈旭麓著《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陈旭麓、费成康著《邹容和陈天华》（祖国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冯祖贻著《邹容陈天华评传》（中国近代人物评传丛书，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和鄧志编《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等。

对于邹陈合传，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邹陈合传，理所当然。尽管一个生在四川，一个生在湖南，家庭背景、经历和性格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具有爱国民主思想，都用至诚的文字为革命鼓吹，而且都过早地死于英年，牺牲在革命正在进入高潮之际，因此特别使人们深感钦佩而又惋惜。邹容和陈天华都是有崇高理想、远大抱负并且才华过人的英俊青年。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性格，陈天华的湖南‘霸蛮’精神和邹容的巴蜀清奇气质，使他们的短促生命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为这一代仁人志士写传，如果有一大批好的传记，则将可为今天的青年提供一座有立体感的、虎虎有生气的辛亥革命时期年轻英杰的群像。”^①至于邹陈合集，鄧志在《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的编序中称邹陈二人的作品都是 20 世纪初年“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作”。

他们的这些话，也可以用来说明我们把杨毓麟、陈天华、邹容三人

^① 章开沅为冯祖贻著《邹容陈天华评传》所作序言。

的文章合编成一个集子的原因。杨毓麟与陈天华是湖南同乡、留日同学、革命同志，并同以蹈海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诚如姜泣群《朝野新谭》所言：“陈天华杨笃生两先生，皆于满清专制时代，以文字鼓吹革命之先觉。检阅两君之历史，其才识、志行、境遇，无不相同，亦可谓革命悲惨史上之奇谭也。呜呼！天既前后而生奇才于湘地，卒竟使其前后而从屈大夫游，何其忍哉！”^①而且，他们三人都是在1903年前后进入政治生涯的年轻人，都以自己的慷慨激昂的文字呼唤人民迎接革命的到来，都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广泛传播，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同时，他们的著作《新湖南》、《革命军》、《猛回头》与《警世钟》先后问世，互相借资，共同有着爱国与革命的主题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也共同有着庸俗进化论、大汉族主义等思想缺陷，反映了历史转折点上人们思想的过渡性。把这些文字编为一册，各篇文章参照阅读，才能更好地把握辛亥革命思想准备阶段青年革命家们的思想脉搏，更好地理解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不出十年就取得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伟大胜利的历程。

杨毓麟，字笃生，号叔壬，别号蠹盒，改名守仁。1872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高桥乡一户耕读传家的普通农户。幼时受的是传统教育，读过四书五经、史籍古文，中过秀才，选过拔贡，还成为“候选知县”，只是他无意仕进，并未谋求实职。他在湖南省城岳麓、城南、校经三书院肄业，广泛阅读清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其留心经世之学。在维新运动中应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任《湘学新报》撰述，主张变法维新，立志改造社会。1902年起三渡扶桑，初入弘文学院，继进早稻田大学。湖南留学生创办《游学译编》，他积极参与，并担任编译工作，接触通过日本人译介的西方学说，探寻救国真理，逐步由爱国转向革命，该刊宣传政治革命、种族革命思想的文章大半出自其手笔，鼓吹湘省脱离满政府而独立。通过学习西方启蒙思想和政治学说，他提高了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认识，加深了对“中等社会”在救国、革命中之重要作用的理解，乃撰《新湖南》，倡言反满独立，广为流传。参加拒俄义勇队，在《游学译编》发表《满洲问题》和《续满洲问题》长文，揭露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警示列强借满洲问题再

^① 姜泣群：《民国野史》（又名《朝野新谭》），影印本，325页，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议瓜分中国，并声讨清政府卖国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后参加学生军改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主张用暗杀和起义等武装斗争手段推翻清廷。曾与苏鹏等组成暗杀团，试制炸药，成为革命党人中制作炸弹的高手，于1904年潜入北京谋炸慈禧太后，未果。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充五大臣随员以图策应吴樾行刺，未遂。并未暴露的杨毓麟于1906年初随考察大臣载泽等到达日本，与黄兴等联系，加入同盟会。考察中，于法政知识所得甚多，然以政府非有真立宪之精神，不屑追随，便辞职返沪，设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1907年与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任总主笔，才出报36号，报馆失火，幸免于难，发表《本报三十七号纪念词》，欲将坏事变成好事，以火灾为除旧布新之征兆，宣言“今神州之黑暗将被扫除，新神州之光明将益发见”。1908年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至英国，翌年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学习，兼充《民立报》欧洲特约通讯员和同盟会驻英联络员。与孙中山会晤，建议设立远东通信社，得到孙中山首肯。1910年，汪精卫等在北京谋刺摄政王，所用炸药系杨毓麟从苏格兰购寄。1911年闻黄花岗起义失败，悲愤忧伤，旧疾加剧，遂至利物浦蹈海自杀。其族中叔祖兼同学杨昌济在《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中述其死因称：在国内时，“君既奔走江湖，积年劳瘁，感愤时事，脑疾时发。加以报馆事务异常繁琐，精力大亏”；在英国时，“研习英文甚苦，脑疾愈甚，顾勤敏性成，不自制，明知用功过度于身体有伤，而苦学如故。……读英文报纸，见其主张强权，不讲公道，愤甚，尤痛心疾首于日本人之强横。顾见时事日非，政府卖国，而国民无力能排除之也，益愤闷不能自己，而病乃日深矣。至今年闰六月初旬因服硫磷药品太多，脑炎狂发，遍体沸热，不复可耐，乃乘车至利物浦，作遗书与友人，以闰六月十一日投身利物浦海中”^①。杨毓麟死后，时人撰文哭之：“今笃生从灵均（引者按：指屈原）于千百载下，则后人论其人，识其事，想象其忠愤之怀，引风凭吊者，较之灵均当何如？呜呼！昊天不吊伤我天民，以吾人切盼之英杰乃不克竟其志，以大有为与斯世，卒以蹈海忧愤死，岂不重可恸乎？昔屈原死而宗国卒陷于沦亡，今笃生死，祖国前途当何如乎？故吾人之哭文豪，不只为文豪哭，亦为祖国前途放声一哭也。”^②

①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载《甲寅》，第一卷第四号（1914年11月）。

② 天复：《哭文豪》，载《民立报》，1911-08-22。

真是无独有偶，在杨毓麟在英国跳海自尽前六年，湖南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日本蹈海，三个月后，另一位湖南革命志士姚宏业在上海投黄浦江而死。虽然陈天华在绝命书中交待说“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但该规则确实是导致陈天华蹈海、姚宏业投江的重要因素。规则颁布后，中国留学生群起而抗争，并因策略不同而产生分歧，有继续留在日本的，陈天华是其代表人物之一；有集体离日返国的，姚宏业亦是代表人物之一。陈天华是因为看见抗议规则的中国学生中一些人的不端行为被日本报纸诋毁为“放纵卑劣”而大受刺激，想以自己的死触动留学生注意讲究私德，以便维护中国人的形象和中国的国格。姚宏业则是因为为返沪学生开办的中国公学经费拮据，办学困难，受到顽固官绅肆意攻击愤而投江自尽的。一连三位湖南志士蹈海警世，原因何在？是三湘多奇士，湖南人的强悍、霸蛮的性格造就了他们不怕死的精神？还是如青年周恩来所吟咏的那样“难酬蹈海亦英雄”，他们壮志难酬，遂以蹈海的英雄行为舍生取义？抑或是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悲壮之举感召着楚人的子孙？我们还是认真阅读他们的文章，沿着他们的心路历程，探寻他们蹈海的深刻原因吧。

杨毓麟著作甚多，首推《新湖南》影响最大。康有为曾发表《辨革命书》，宣传“合则强，分则弱”以及“惧外人之干涉”的观点，攻击革命派欲分现成大国为数十小国，以力追印度，是自取弱亡；赞扬满洲合于汉，大有益于中国。《新湖南》针对这些观点予以回应，认为非大国不能立足世界，西方列强侵略远东，必须靠中国集同洲同种来抵抗。但在满政府统治下，难以完成此使命。该书是杨毓麟受太平洋客（欧榎甲）所著《新广东》的影响，以“湖南之湖南人”署名撰写出版的。《新广东》论述广东自立之基础和应当自立之原因，分析广东不知自立之害，认为自立当先做预备并去俗见，陈述广东自立三策（开自立报馆、开自立学堂、联秘密社会）。主张各省先自立，然后建立联邦政府，以达全中国自立之目的。《新湖南》根据这个思路，“论湖南之形势与湖南人之特质，发挥民族主义，寓地方独立之意”^①。当然，《新湖南》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理论上加强了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实践上主张以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对推动当时的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较大作用。这些都大大超越了《新广东》。

^① 杨毓麟：《〈新湖南〉再版广告》，载《游学译编》，1904（11）。

我们已知陈天华曾借资移植《新湖南》部分内容，如两者都引用了“民族帝国主义”概念，都揭露了帝国主义通过政治、军事、经济、传教等手段掠夺中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其实，杨毓麟关于民族帝国主义的论述，也是借资移植了美国学者灵绶的《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一书，当然还借资了同时代中外人士的其他著作。

灵绶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原书名为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1900年在纽约出版。日译者为高田早苗，明治三十四年由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出版。中译者是罗普，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活版部印刷。该书对日本和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学者郑匡民说：“这本书是围绕着中国问题论及当时世界列强所执的帝国主义政略。高田早苗称此书‘是解释刻下重大问题的最有价值之书’。”^①梁启超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时坦言“篇中取材多本于美人灵绶氏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氏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而参以己见，引申发明之。不敢掠美，附识数言”。在从前撰写文章，编著作品，借资移植成为风气的时代，梁启超能够做这样的说明，用今天的话说，比较符合规范。据郑匡民考证，梁启超当时所参考的是灵绶该书的日译本。

灵绶的书共五编，第一编为“民族帝国主义”，下分五章，分别论述“自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帝国政略之手段”、“列强之殖民”、“殖民政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民族帝国政略之结果”。第二编为“中国开放门户”，下分三章，分别论述“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特点”、“诸外国在中国所得利益之性质”、“中国之现在与未来”。第三编为“支那开放对世界政治全局的影响”，主要论述“俄国之帝国政略”、“东洋形势对西欧诸国的影响”、“东西文明之接触”、“中国开放的一般影响”。第四编主要论述德国的帝国政略。第五编论述美国在东洋政治中的地位。《新湖南》部分内容很显然是借资了这部著作的。

灵绶认为，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的原因是各国过分发展，人口增长，而土地有限，所以要向外伸展。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非一二人所能为，无人能抵挡。杨毓麟也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民族主

^①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18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义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其为此主义之原动力者，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国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胀也；亦非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也，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发生之基本，则全国人之思想也；运动之机关，则全国人之耳目也。故其风潮之猛，若倾海水而注之大陆，而吾国民乃无一着不失子，无一处不退步矣”。

杨毓麟在分析现今大局之危迫的时候，引用了灵绶书中关于民族帝国殖民政略与手段的观点，揭露列强对殖民地的政略是施行帝国主义之方针，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政略、铁道政略、矿产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使达于周密完全之地。并联系中国实际，一一剖析了列强运用这些政略对中国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通过描绘中国和湖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所呈现的险象，借灵绶在《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中关于“中国不及此五年自强，五年以后决无可措手”的预言，警醒国人，首先是湖南人尽快改造中国社会以图存。在论述民族建国主义时，也借资了灵绶书中关于近代国家形成原因的理论和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并引申说：“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桃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而中国既不是单一民族国家，汉人置于满人统治之下；又无个人自由权，国民在专制统治下毫无权利。在此情况下，他强调民族建国主义和个人权利主义的重要，称民族主义和个人权利主义，是生人之公理也，天下之正义也。有阻遏此主义使不得达者，卧薪尝胆，矛渐剑炊^①，冀得一当而已矣，公理然也，正义然也。出于对满政府抵抗侵略的绝望，对民族联合的急切，杨毓麟号召湖南人以对湖南的责任、对全国的责任，用“破坏”、“独立”手段，先脱离满政府，建立一个新湖南，实行地方自治，并带动各省均“新”之，使各省以独立之亲和力聚而为新中国。他大声呼号：“欲新中国必新湖南！”

《新湖南》出版后，与《新广东》一起风行全国，“一时湖南新学少年游日本者，翕然称之”。

《新湖南》与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一样，存在着这样一些局限性，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对挽救危亡的基

^① “矛渐剑炊”，亦作“剑炊矛渐”，语出《世说新语·排调》“矛头渐米剑头炊”，意为矛头淘米而剑头炊饭，形容处境极其危险。杨毓麟在文中活用此典，写作“矛炊剑渐”。而以往部分编者不明其意，或误为“矛炊剑渐”，或误为“矛炊剑折”。

本社会力量视而不见，并没有找到革命的正确途径，而是侧重于采取俄国虚无党的恐怖主义手段进行所谓的“破坏”。还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等等。这些问题在邹容、陈天华的著作中同样存在，下面将做分析，此处不赘。

本书收录了杨毓麟关于满洲问题的文章。1903年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企图日益明显，这不仅关系到满洲一隅之存亡，而且中国之存亡系焉；处心积虑打满洲主意的不仅一俄罗斯而已，世界列强亦均注目于此，杨毓麟认为“满洲问题，非一满政府之问题，而世界各国经营极东者之问题；非世界各国经营极东者之问题，而为亚洲大陆主人翁之中国民族存亡之问题也。”数月以来，风云万变，其存其亡，系于旦夕。杨毓麟有鉴于此，搜集日本和西方各媒体的大量资料，加以论说，撰写了《满洲问题》和《续满洲问题》长文，详记此问题之原因及各国侵略之现状以及我国应对之方法，主张国民用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办法解决中国主权存亡之问题。文章指出，清政府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势必举黑山白水全壤而奉之于俄”，从而引起英之在长江上下游，日之在福建，德之在山东，法之在广西、云南、贵州加紧势力范围内的侵略，从而导致瓜分危机又起。我国民于此问题，要以冲决网罗之决心，用实行民族建国主义之手段，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承认满政府使得仍旧垄断吾民族主权，满政府所外市之主权，他国不得以享有之；夺满政府以夺他国，而后吾民族拥护主权之势力，无往而不伸”。他阐述关于独立的见解称：“独立者，国民一切事业之母。一隅独立，则足以号令一省；一省独立，则足以号令全国”；“曰独立而依赖强援者，是独立之性质不完全也”；“独立者，非独对于满政府，抑亦对于全世界”。他在文章中号召国民以不怕死的精神挽救危亡：“知死则蹈死，知死蹈死则可以独立，可以与满政府宣战而保存主权!!! 可以与俄、英、德、法、美、日本宣战而收回主权!!!”两篇文章所抄录的大量国外媒体的文章，为我们保存了研究满洲问题和当时国际形势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还收录了几篇《神州日报》的社论和时评。杨昌济称赞杨毓麟说：“每著一论，精神迸露，义气凜然，读者深为感发。君固工文辞，有远识，具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盖并世所罕觐也。”^①杨毓麟和王无生在《神州日报》担任撰写社论的工作。该报第一天的发刊词由杨毓麟、王无生二人主稿，经社长于右任参订而成，故署名“三

^①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载《甲寅》，第一卷第四号（1914年11月）。

函”。此文意内言外隐含民族主义之情绪，与当年《苏报》、《国民日报》的激烈革命言论不同，为避清廷文网只能作迂回宣传。其内容，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摭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历举我国之人种智慧、宗教观念、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法律系统、文学思想、冒险性质等种种特色，如数家珍。说明该报办报方针是“指陈得失，穷极端委，鞭策顽懦，导启贞元”，许诺力免新闻报纸容易出现几种弊病。我们选录此文就是因为它是旧文学之代表作。冯自由在《上海神州日报小史》中称其文字高古典雅，赞誉其“益足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诚旧文学中之代表作也”^①，一时士林传诵。

可能怕多数读者看不明白用高古典雅的文言文撰写的发刊词，该报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刊载了杨毓麟撰写的社论《论本报所处之地位并祝其前途》。杨毓麟认为，我国近十年来日报开始渐次具有政治新闻之性质，但尚不能与世界各国办得好的报纸相颉颃。在今后我国之政治事情不得不与世界各国相追逐的形势下，我国报纸之实质与态度亦不得不渐与世界各国之程度渐次相接近。为了紧跟国内外迅速变化的形势，为了追赶世界各国报纸的程度而创办的《神州日报》，出于对国民的责任，每天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时事问题，及时报导，“对于政府则有呼吁而已矣，有问难而已矣；对于国民则有陈诉而已矣，有贡献而已矣”。并希望国民加强团结，坚强意力，改造国家，革新政治。其所祝之前途为：“由此而十年而百年而千万年，追逐吾国民政治事件之发达，而促成吾《神州日报》新闻事业之发达。”此文与上文如果参照来读，则可对于杨毓麟等的办报思想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论报律》是一篇简短的社论，阐述报纸对于国家、社会之重要性，揭露清政府拟颁布《报律》约束报纸，控制舆论的伎俩，预言这一目的必将达不到：“欲用此以为新闻事业之障碍，则吾未见其术之果售也。”

《危言脞录》是一篇论说，鉴于人的心理一般认为父誉其子，不如邻人誉之之见谓诚，吾人之所谓危者，抑亦不如外人所谓危之见谓真确也，遂抄录日本和俄国报纸关于中国将蹈高丽覆辙的言论，如日本《朝日新闻》根据帝国主义强盗逻辑所做预言：“支那民族，苟不幸不能自治，致累及外国，则欧洲诸国与我国不得不起而干涉之。”因为他们高丽已经这样做了。俄国《诺威乌列米亚日报》说得更明确：“日俄战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44～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